

清代藏書史論稿

鑄以余素与抱冲好故時劉鵬著此冊昨歲假錄至今始竣事而還之檢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有云宋板駱賓王集二本藏經紙面八兩當即
是書近日書價踊貴其視毛氏所估不知又添幾倍何和兄弟其善
守之嘉慶甲子十月十四日黃公烈識



陳氏書錄解題言其卷首有魯國郝雲卿序又言蜀本
序文云廣陵起義不捷而遁皆與此合唯魯國下郝雲卿
之名毛鈔所據損失耳然則為蜀本略集可知也

嘉慶丁卯九月廣所審定并記



国家图书馆天津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全國百佳

和漢書

清代藏书史论稿

刘鹏 著



国家图书馆文津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藏书史论稿 / 刘鹏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 - 7 - 5130 - 5700 - 4

I. ①清… II. ①刘… III. ①藏书—图书史—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G259. 294.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7672 号

责任编辑: 刘 江

特约编辑: 李兰芳

责任校对: 王 岩

责任印制: 孙婷婷

清代藏书史论稿

刘 鹏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 50 号院

责编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344

发行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960mm 1/16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312 千字

ISBN 978 - 7 - 5130 - 5700 - 4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编: 100081

责编邮箱: liujiang@cnipr.com

发行传真: 010 - 82000893/82003070/82000270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

印 张: 22.25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蒋 寅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这句名言，再形象不过地说明了书籍与文明的关系。如果说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使用符号的能力，那么书籍正是使人类得以高踞于生物链顶端的必要条件，它使文明变成可以较快积累和习得的有形物质，而不必依赖于缓慢的基因遗传。华夏民族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就有两项与书籍相关。造纸术和雕版印刷技术的领先，让我们的文化生产和积累在中古时代走在世界前列。如果不拘泥于书籍的物质形式，那么书籍在古代中国有着更悠久的历史，大思想家老聃的图书馆馆长身份（柱下史）已然预示了藏书与思想、文化的直接关系。稍后的改朝换代，除了地理疆域，真正有实质意义的只是图籍占有权的变更。

随着社会形态的更迭，文化权力垄断的崩溃和文化资源的扩散，插架缥緗成为社会风雅的标志景观。史文所见，唐代士大夫间已有藏书风气，迄两宋而极盛，而一代的学术风气和文学作风也因此大异于前世。照先贤的看法，南方文化在元代就整体超过北方。其表征除了城乡经济的高度发展外，江、浙、闽三地发达的图书业也是最为显豁的标志。书籍传播、滋养了文化，同时也是文化最好的装饰。钱谦益曾说：“自元季殆国初，博雅好古之儒，总萃于中吴，南园俞氏、笠泽虞氏、庐山陈氏，书籍金石之富，甲于海内。景天以后，俊民秀才，汲古多藏，继杜东原、邢蠡斋之后者，则性甫、尧民两朱先生，其尤也。其他则又有邢量用文、钱同爱孔周、阎起山秀卿、戴冠章甫、赵同鲁与哲之流，皆专勤绩学，与沈南启、文征仲诸公相颉颃，吴中文献，于斯为盛。”（《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朱存理传）我们很难断言，究竟是文化发达带动了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发达催生了文

化的繁荣。可以确信的只是，文献最盛的吴中，也是天下最富庶的地方。

说到吴中文献之盛，不能不提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廷编纂《四库全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当今学者过于计较它对古书的禁毁（其实与编书没有必然联系）和篡改，而忽视了它对书籍流通状况的改善。《四库全书》抄为七部，分贮于内廷及扬州、镇江、杭州等地，文汇阁、文宗阁和文澜阁所藏即所谓“南三阁”本，听凭士人登阁阅览，这不就是中国公共图书馆的雏形么？在此之前，民间阅读主要依赖私人藏书。而那些藏书之家，书多秘不示人，世间流通的图书不出厂肆所售。《四库》馆既开，广征天下之书，故家多出珍本秘笈以献，纂修之官又借机抄出，遂使一大批珍稀古书流通于世，刺激了私人藏书的发展，同时带来学者、藏书家的交流互动和乾、嘉之际学术的繁荣。

乾隆间著名的文化沙龙，如孙星衍的平津馆、翁方纲的小石帆亭，王昶的兰泉书屋、蒲褐山房，朱筠的椒花吟舫，阮元的定香亭、研经室、琅环仙馆，都是著名的收藏之府。而这类主持或赞助文化事业的沙龙，由达官贵人的府邸下移到各地富商的宅第，也是乾隆时代的一个醒目现象。诚如袁枚所说，“升平日久，海内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顾阿瑛、徐良夫之风，蓄积书史，广开坛坫”（《随园诗话》卷三）。比较著名的当属扬州马氏兄弟小玲珑山馆，天津查为仁水西庄，杭州赵公千小山堂和吴焯瓶花斋。马曰琯、马曰璐昆季以业盐拥巨赀，雅好文艺，收得传是楼、曝书亭旧藏，礼致四方文人，长年寄居其第，从事经史考订、诗文著述。厉鹗的《宋诗纪事》一百卷便是居停马氏多年，利用其丰富藏书而编成的。考究乾隆时代文学、学术的盛况，不能不顾及那个书香飘逸的历史氛围。

的确，乾、嘉两朝也许是中国藏书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社会整体的安定和富庶培育了浓厚的藏书风气，藏书家队伍和收藏规模都达到空前的水平，历来流传有自的宋元名槧逐渐集中到一批财力雄厚又见识精到的藏书家手中，成就了一个众星璀璨的藏书时代。而以“藏书四友”著名的周锡瓚、顾之逵、黄丕烈、袁廷桢四人，正是其最突出的代表。当时有一位学者洪亮吉曾将藏书家分为五等：

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讎家，如卢学士文弼、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匱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乌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贋，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北江诗话》卷二）

“藏书四友”大抵可归于赏鉴家一类，力求宋槧名刻，精于版本考究，是其共同特点。尤其留意递藏源流，每得一书必识其由来甚至所费几何，总之是几类藏书家中最专注于收藏活动本身的。他们的藏本不仅版本价值高，而且多留有手跋，记载其书流传之迹与版本异同，对于考察古代书籍的集散最有参考价值。缪荃孙和王欣夫分别辑录黄丕烈的题跋，编为《黄尧圃藏书题跋》及续集，成为治文献者必读之书。至今我们要研究古书在清代的流传，《尧圃题跋》仍是最重要的史料。

不过，“藏书四友”当时虽齐名并称，身后的显晦却不同。黄丕烈备受文献学者的关注，而周锡瓚、顾之逵、袁廷桢三人很少被人提到。为此，早几年刘鹏说打算做“四友”研究时，我觉得是个很有价值的课题。文献学自晚近列入大学课程，一直分为版本、目录、校勘三个板块。将典藏收入文献学的视野，始于先师程千帆先生与徐有富学长合著的《校讎广义》。该书“叙录”首次在文献学的视野中阐明了典藏的地位与意义：“盖由版本而校勘，由校勘而目录，由目录而典藏，条理始终，囊括珠贯，斯乃向、歆以来治书之通例，足为吾辈今兹研讨之准绳。”书中首先发明“典藏学的建立与典藏的功用”，然后以典藏单位、图书收集、书籍亡佚、图书保管、图书流通五章论述图书典藏学的基本内容，其核心内容与图书集散的历史

多有交集。众所周知，先师之学托基于文献校讎，最初发表的论文都涉及文献考证，中年倡为考据与批评相结合的文学研究法，晚年接引后学更以文献学加文艺学揭橥宗旨，是故及门诸子莫不以文献学为治学门径，薄有著述，多出入于文献、文学之间。

刘鹏初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随我攻读硕士学位，也驯闻此旨。他本来文献基础扎实，与同届李桃合纂《毗陵集校注》，完成得很好。到攻读博士阶段，仍能踏踏实实地阅读基本典籍，将前四史一部一部读完，写下不少札记，让我感觉很难得。正是鉴于他文献基础好，我反而常提命多读理论书籍，培养理论思维的能力。博士论文以初盛唐诗与《文选》的关系为题，将初盛唐诗中因袭、脱化《文选》的例子一一摘出加以分析，用一个看似笨拙而其实很直观的方式展现了初盛唐诗歌深受《文选》影响的事实。全文字数达到三十多万，清楚地显示出独立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能力。

毕业后刘鹏就职于国家图书馆研究院，我为他得到一份好工作而高兴，同时也为他难以致力于诗学研究而惋惜。毕竟学术研究也须根据环境提供的条件来选择课题和研究类型，身处国家图书馆这一文献重镇，能从事有关版本、目录的研究不用说是最好的选择。得知他参加詹福瑞先生主持的“大陆藏汉文古籍藏书题跋整理与研究”课题，辑录国图善本书中的手书题跋，并对藏书史发生兴趣，我很欣慰，并相信以他的天分和努力，可望成为一名优秀的版本、目录学者。

转瞬八年过去，刘鹏在版本、目录学方面已有相当的积累，藏书史研究也按部就班地进行。重新辑校堯圃书跋之余，他对“藏书四友”的生平事迹及往来售让、切磋之迹作了细密的考证，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最近他将相关论文裒为一集交付出版，请我作个序。我向来不为自己指导的学位论文作序，这部《清代藏书史论稿》不是我指导的研究，不在此限，欣然命笔。

所谓藏书史研究，不外乎人和书两个要素，前者涉及藏书家的收藏兴趣和范围、经济能力和交易经历、保藏方式和研究活动内容，后者涉及书籍的流传、递藏、分合及归宿等内容。刘鹏此稿上编论人，中编论书，

下编则介乎人和书之间。作为绪论的《清代藏书史研究的内容、方法与愿景》一文，表达了自己对清代藏书史研究的一整套想法，是具有学科建设意义的纲领性文字。正文各篇考论，也都出于自己的研讨和发现。尤其是涉及“藏书四友”的篇章，发学界所未发，对清代中叶的藏书史研究饶有贡献。《士礼居善本书志稿（一）》虽只是重辑尧圃题跋的部分成果，一斑窥豹，也足见用功之深。其他论文，或辨析版本，或考释题跋，都能厘清书籍递藏的源流，发覆良多。浏览全稿，可以看出刘鹏这些年来沉潜典籍、精进不已的学术印迹。

先师当年在南京大学同时指导古典文献学和唐宋诗研究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如今我在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忝为古典文学和古典文献两个专业的导师，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给文献专业的学生上课。尽管我在广西师范大学读硕士生时，也从胡光舟老师学过版本学和目录学，但后来发觉除了一些粗浅概念，脑子里基本没留下什么系统的知识。多年摸索古籍，让我越来越感觉到，文献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其中许多知识不是教科书或讲义能教给你的。尤其是目录和版本的知识，勤翻书查书，自然就懂得，反之若不接触古籍，只看前人论著，最终还是门外汉。这就意味着，文献学是从事文史研究的一门基础学问，熟练掌握版本、目录学知识，只是进入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门票。我高兴地看到，尽管守着天禄琳琅的庋藏，刘鹏没有自限于版本、目录研究，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藏书史。这是较版本、目录学视野更为广阔的学术领域，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同时塑造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状态。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乡绅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地方文化事业的主持者或赞助者，那些书籍富甲一方的藏书家往往成为四方瞩目的文化英雄，其荣替也成为地方文化盛衰的象征。这就使藏书史研究很自然地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这个意义上，谁能说藏书史研究不是一门值得重视的大学问呢？我期待着本书绪论所表达的学术愿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前 言

本书是笔者对清代藏书史及相关文献的研究。

绪论“清代藏书史研究的内容、方法与愿景”，为清代藏书史的研究领域、史料范围、研究方法等问题的宏观论述，是笔者多年所思与所待。

上编“怀瑾握瑜——藏书之家”，为清代藏书史的相关重要人物黄丕烈、袁廷桢、顾之逵的研究。其中黄丕烈、顾千里交恶研究，黄丕烈字号斋印的全面考订，尝试于旧问题提出新见解；袁廷桢、顾之逵两位藏书家的研究，则或有填补空白之意义。

中编“芸香永续——宋槧明抄”，为古籍善本的版本学和书籍史研究。涉及黄丕烈士礼居、顾之逵小读书堆的善本书志，三种清代稿抄本的版本，以及古籍作伪的研究。在传统的版本学考订之外，笔者亦尝试以社会文化史为背景的书籍史研究方法。

下编“丹黄灿然——文字犹传”，为古籍题跋及古籍校勘学研究，包括顾之逵、袁廷桢手书题跋的首次揭示，陈登原先生《古今典籍聚散考》的商榷指瑕。

附编“学步捧心”，为笔者仿效先贤所撰藏书题跋数种及国立北平图书馆抗战时期的馆史研究，略表希慕外，亦探究国家图书馆的历史困境及其对策。

目 录

绪 论

- 清代藏书史研究的内容、方法与愿景 (1)

上编 怀瑾握瑜——藏书之家

- 黄顾交恶新解 (23)
- 黄丕烈名号藏印释义发微 (48)
- 袁廷桢生平发覆
——一个苏州家族的兴衰 (76)
- 顾之逵生平及书事述略 (106)

中编 芸香永续——宋槧明抄

- 士礼居善本书志稿（一） (139)
- 重辑小读书堆善本书志（经部） (173)
- 清黄增禄稿本《拜石词》及诸家题跋考略 (201)
- 诸本《高氏三宴诗集》考略
——兼论两种“双生”清抄本 (212)
- 国家图书馆藏清顺治间傅以渐家抄本《贞固斋书义》及诸家序跋
考略 (219)
- 深心作伪，百密一疏
——以宋刘克撰《诗说》的宋刻本伪跋为中心 (231)

下编 丹黄灿然——文字犹传

国家图书馆藏顾之逵题跋考释	(249)
国家图书馆藏袁廷枬题跋考释	(261)
《古今典籍聚散考》求瑕	(280)

附编 学步捧心

广韵楼藏书记	(293)
题《中国人的精神》	(295)
《冀淑英古籍善本十五讲》题记	(296)
《史讳举例》题记	(297)
《博物志》题记	(298)
《广州图书馆藏可居室文献图录》题记	(300)
《寸纸留香——国家图书馆西文藏书票集萃》跋	(302)
《李劫人晚年书信集》题记	(303)
《元代文人心态》题记	(304)
中央图书馆的成立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困境及其纾解 ——以抗战为中心	(305)
后 记	
——八年的所历与所思	(330)

绪 论

——清代藏书史研究的内容、方法与愿景

引 言

清代是一个学问的时代，不仅诞生了乾嘉学派这样影响深远的学术群体，在经、史、子、集乃至西学诸般领域，其知识生产也集历朝之大成，蔚为大观。

就参与人数而言，可谓巨子丛出，群贤竞起，而他们所留下的著作，也远迈前代。今人笔下所谓“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其实绝大多数都是清人著述。据杜泽逊先生《清人著述总目》统计，有清一代著述（含亡佚者），约计22.75万余种。^①

去今未远，文献浩繁，是以只要惟志惟勤，清代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有较为清晰、切实的答案，而不必在只言片语中，揣度秦汉人物，怀想邺架风流。因此，21世纪以来，以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启动为标志，清代历史（这里并不限于历史学科）的研究，逐渐成为相关学科的热点和新的增长点，从业者之众，新成果之多，都令人瞩目。

在这一片方兴未艾中，作为收藏风气最盛的时代——学问与收藏本是天然相映发的——清代藏书史的研究却相形失色。虽然自清末至今，既有袁同礼《清代私家藏书概略》、谭卓垣《清代藏书楼发展史》这样

^① 杜泽逊：“《清人著述总目》述例”，见《微湖山堂丛稿》（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06页。

篇幅较小的宏观论著，也不乏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丁延峰《海源阁藏书研究》、刘蔷《天禄琳琅研究》这样或拓新体，或树高标的力作，但整体而言，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仍处于鸿蒙初判、新境待开的状态。其内容往往限于珍稀版本的考订和人物生平的叙述，其研究者多为图书馆从业人员或文献学领域的少数学者，而乏历史、文化领域学者的广泛参与，这也符合许多历史分支草创阶段的特点，^①即更多关注行业内容和具体细节，而缺乏历史的观念与方法。

自2010年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进入国家图书馆研究院，笔者的工作内容、研究兴趣，逐渐从古代诗学转向藏书史尤其是清代藏书史领域。八年间，从参与詹福瑞先生主持的“大陆藏汉文古籍藏书题跋整理与研究”项目、负责“《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题跋整理”项目日常工作，去善本阅览室一条条抄录藏书题跋、一方方辨识藏书印章，并广泛接触专业界同人开始，到选择藏书家个体、群体加以研究，乃至探索更为宏观的规律，在学而思之与师友论辩中，慢慢形成对于清代藏书史的一些尚不成熟的看法。

笔者以为，藏书史意在以收藏者的藏书（访书、购书、抄书、校书、刻书乃至散书）活动为中心，研究这一活动涉及的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现象及其相互作用。而其可论者，约有四方面：

- （1）藏书史研究的内容与核心；
- （2）藏书史研究的史料问题；
- （3）藏书史研究的路径问题——理论、方法与题目；
- （4）藏书史研究的愿景。

今请以清代为例，分而言之。

一、藏书史研究的内容与核心

笔者认为，书籍和收藏者（人、机构）的活动是藏书史研究的两大

^① 如医学社会史在英国的发展即是由以医学界人士为主，向非医学界人士为主转变。

内容；而藏书史研究的核心，则是以收藏者（人、机构）为代表的形形色色与书有关的人及其活动。

（一）书籍

1. 中外之传统

中国的古籍研究，一向较为重视“善本”，而善本的定义，则因以代降。清代最重宋刻，故陆心源、杨以增分建“皕宋”“宋存”之楼、室，钱曾、黄丕烈皆有“佞宋”之雅称；^①至清末，宋、元刻本，影宋、明抄，乃至较为罕见的明刻本，均为藏家所重。总体而言，所谓的“藏书家”之“书”，多指善本而言——虽然他们无一例外拥有数量远为庞大的“普通”书籍。

以善本书为核心的版本目录学研究，构成中国传统古籍研究的主要取向，并延续至今。从研究形式上，笔者以为较为重要者，一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意义上的目录之学，二是从创作（作者）、生产（版本）、流传（递藏）等角度全景式深度展现古籍内涵与外延的（藏）书志之学。二者一偏内容，一偏形制，在实际中往往难以分割，全看撰写者的学养所系。清代名家自不必言，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即使以新学（西学）见称，这方面的学问，往往也都造诣颇深，如王国维的南浔蒋氏传书堂藏书研究（以《传书堂藏书志》为成果）和宋刻本研究（以《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为代表），以及胡适的《红楼梦》《水经注》研究，都得益于此。

时至今日，中国古籍中较为重要者（包括但不限于宋元本），多已随着点校整理本的普及而“形”“神”两分。今日之文史学者，虽普遍接受过版本目录学的相关训练，却日渐隔膜于那些借阅不易、使用不便的善本，以及版本目录学的相关研究。而我们所熟知的藏书史意义上或

^① 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录》云：“然生平所酷嗜者，宋槧本为最。友人冯定远每戏予曰：‘昔人佞佛，子佞宋刻乎？’相与一笑，而不能已于佞也。”参见：（清）钱曾撰，瞿凤起编：《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12页。顾千里《百宋一廬赋》云：“佞宋主人搜求经籍，鸠集艺文，深识妙览，博学瞻闻。”黄丕烈自注云：“‘佞宋’出《述古堂书目序》，予恒引为窃比，故居士设此名也。”参见：（清）顾千里：《顾千里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页。

文献学层面的古籍研究，也已逐渐与内容研究剥离，或者说，从业者已自觉将其限于“版本”这一层面，而形成其研究的“护城河”。但即使在这一层面，目前也面临某种滞碍：对于版本学，业界整体上并不比20世纪以顾廷龙、赵万里、潘景郑、冀淑英等为代表的前辈有更深的理解、更高的造诣，甚至更精微的“观风望气”之能；^①而预期中因研究条件极大改善而伴随着的对于古籍版本的全面梳理和理论升华，也并未如期而至。

所谓无独有偶，西方自20世纪初以来，也有一门与中国的版本目录学差相仿佛的学问“Bibliography”，可译为“目录学”或“书志学”，而“书志学”似更符合其内涵。^②“书志学”（bibliography）分为彼此紧密相关的四个方向。

（1）列举书志学（enumerative bibliography）：按照一套统一的原则如作者、书名、时期、主题或其他要素列举图书。每一条目包括书名、作者、出版日期、出版地点等，类似文献目录。

（2）分析书志学（analytical bibliography）：调查图书的印刷过程和图书的所有物质要素，在所得出的相关证据的基础上重建图书形成和传播的历史。书志分析是书志描写的预备阶段，为描写书志学提供所需的术语、数据、技术以及描写的基础。其类似中国的版本学或版本考证。

（3）描写书志学（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按照多种分析角度得出的结论，按固定体例对图书的书名页、插图、字体、装订、纸张等物质要素进行系统描写。个人以为有些类似中国的藏书志。

（4）文本书志学（textual bibliography）：甄别文本异文及其来源，

① 关于“观风望气”，笔者较为认同沈乃文先生在《北宋刻本〈经净社集〉与版本鉴定》中的论述：“观风望气原本为勘宅占验用语，常见以占风望气为多。……前辈学人所以借用观风望气，是作为形象化的一种比喻。……可知传统的观风望气是比喻面对书卷展开时的直观感觉，而不是以参照书比对后得出的结果。……如果版本有幸流传到以后的时代，则必然带有历经多少岁月的特征，或者说是痕迹，也就是历史感或沧桑感。如上感觉是目检者展开书卷时的第一感觉，前辈学人称为古籍的气息。”参见：《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2~403页。

② 本节采用苏杰先生《中西古典语文学论衡·西方版本学述略》（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5页）一文的相关论述。

确立最正确的文本形式。类似校勘学。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东西方的“版本目录学”虽然各有其独特之处，但从根本理念方面并无大异。藏书史的研究自然需要依靠它们，但它们终归不能成为历史研究，而只能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与参照。

2. 书籍史之映照

20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术界逐渐兴起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书籍史。西方“书籍史”研究领军人物之一，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在《何为书籍史？》一文中说：“书籍史，其法语名为‘*Histoire du livre*’，德语名为‘*Geschichte des Buchwesens*’，英语国家则将它称作‘*history of books*’或‘*history of the book*’。其叫法随地方的不同而不同，不过无论其身何方，它都被人们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新学科。书籍史，甚或可称作（通过印刷而展开的）交流的社会—文化史（这有些拗口），因其目的是理解在过去的五百年里，观念如何通过印刷传播，如何影响了人类的思想和行为。”^①

从这个层面而言，西方书籍史的理论和实践，目前已经非常深入，深入到近乎得鱼忘筌，从书籍本身的研究，逐渐导向围绕书籍生产和流通中“书籍与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信仰、制度以及与权力变迁的关系”^②这一社会文化研究领域。达恩顿如此描述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新书籍史家所引起的书籍史的转向：

新书籍史家将该学科带入“年鉴学派”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主题范围内。他们不耽于对书目学的细节研究^③，而是力图发现长时段书籍生产、消费的一般模式。他们收集申请“特许权”（*privilèges*，一种版权形式）的数据，分析私人图书馆的具体

① 陈恒、耿相新主编，屈伯文译：《新史学》第 10 辑《古代科学与现代文明》，大象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44 页。

② 张伟：“书籍史研究：核心议题与关键概念”，载《光明日报》2016 年 11 月 19 日第 11 版。

③ 本节字体为笔者加粗。

材料,并通过被人忽略的书籍类型如“蓝皮书”(bibliothèque bleue,最初的平装书)追寻人们观念意识的演变足迹。珍本、善本书不在他们的兴趣之列,他们转而着力探究最一般的书籍,以发掘普通读者大众的阅读经验。(《何为书籍史?》第145页)

这种研究取向从根本上而言至今仍变化不大,与传统的版本目录学研究习惯可谓大异其趣。

3. 中西之融合

愚以为,今日藏书史意义上的古籍研究,传统与新知,中学与西学不妨并存共荣,相互促进与融合。可着重于以下二端。

一曰书志。即在全面梳理、总结前人成绩基础上,为现存古籍(尤其善本)一一撰写书志。此书志,既参照传统藏书志与外国书志学^①,又当有所不同,其说又有三:

(1) 存其真。即对于古籍,做考古标准之标注,^②其版刻、藏印、序跋、批校、递藏之全缺、位置、形制、内容、次序,乃至馆藏地与索书号,皆不厌其详,并可以影像及绘图,补传统方法之不足。

(2) 订其讹。在以上工作基础上,对于现存古籍的著录审慎地陆续加以修订。^③

(3) 求其例。以统计学—计量史学的方法,用大数据手段,对于所有古籍,按其时代(可细分至年号)、地域、刻工等,加以精密分类和

① 如西方书志学中,“书志描写在著录图书基本项目之外,主要对图书物质载体进行全面细致的描写,描写的项目包括开本、折叠、页数、封面加装、书名叶、内容细目、用纸、插图、印刷、检核过的拷贝及其藏家,等等。近些年来,描写所涉及的项目益趋精细”,可以为中式书志作参考。[美] G. 托马斯·坦瑟勒著,苏杰译:《分析书志学纲要·译者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此外,美国还有“书志学会”(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并出版有《美国书志学会论丛》(*Paper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而早在1934年,《图书馆学季刊》第八卷第三期、第九卷第二期即刊登了李尚友所译日本小见山寿海著《书志学》一书。

② 此说得诸高柯立兄。

③ 2015年8月在台湾举行的“鉴藏——两岸古籍整理与维护研讨会”上,上海图书馆陈先行先生曾作“修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刍议”的报告。